

总理重视民营企业家“憋屈”说明了啥

林春浩 时评人

一个多月前,民营企业家吴海在网上发表了写给总理的5000字长信《做企业这么多年,我太憋屈了!》痛陈中小企业在经营过程中遭受的来自基层政府部门的种种不公正待遇,此后,这封信“惊动”了三位国务院领导: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国务委员杨晶均作出批示。(5月18日《南方都市报》报道)

任何企业的发展,都会受到政治环境的制约性影响,比如企业面对执法者利用政策、法律和法规的不公平对待,企业家们要么“顺之者昌”,要么逆之者亡,别无出路。在政策和法制环境不够完善的时代,

企业家们面对不规范的执法,除了选择忍气吞声,或者发发牢骚,根本别无良方。其实,中国的企业家特别是民营企业家的“憋屈”早已有之。由于以前国家经济尚未如此发达,加上某些地方主管领导政绩思想作祟,喜欢报喜不报忧,更有甚者,认为报忧将影响到政绩形象,是“负能量”,导致众多企业家的叫屈声始终无法传达到高层,更别提提到改善执法环境,进而改善自身待遇的目的了。直到最近几年,有关部门才意识到,由于政府职能部门服务跟不上,政企关系有待进一步和谐,进而影响到国家经济发展。于是,政府机构才开始决定由传统的监管走向以服务为主,再加上互联网这一科技革命的重大影响,

最终才使得民营企业企业家这封充满“告状”色彩的公开信能够呈到总理的办公桌上。

那么,民营企业企业家“憋屈”惊动三位国务院核心领导成员,究竟意味着什么呢?笔者认为,至少说明了三个问题。首先,说明民营企业家的命运已经得到了国家、政府的高度关注。人们通过国务院三位主要领导在日理万机之际,能够静下心来阅读基层企业家的“憋屈”信,并诚邀企业家进入中南海参政议政,不难看出政府对民营企业的支持态度。

近几年来,国务院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的政策,所有出发点基本上都是为了通过简政放权,实现执法规范化,激发市场活力,从而达到

到保民生,保增长的目的。可以说,民营企业企业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

其次,说明中国市场执法环境正逐步走向规范化。通过本次“憋屈”公开信事件,人们不难发现,企业家和政府的关系已经发生了显著改观,至少,民营企业家的思想不再像以前那样保守了,面对不公平或不合理现象,不再逆来顺受,敢于依法向上级政府机关直至最高领导人反映问题。这不得不说是个巨大的思想进步,至少说明,企业家的生存环境已经有所改善了,至少不用担心公开信发出后,将来会受到基层部门的打压或刁难。与此同时,基层执法部门并没有像以前众多单位的做法一样,对于涉及自身问题的投诉,采取

删贴等私下解决方式加以处理,可见,他们也能够以坦然的心态对待民营企业家的叫屈。

最后,本次“憋屈”事件将为政府部门由管理职能向服务职能转变提供一定的参考意义。相信本次民营企业企业家吴海反映的核心问题,即“基层政府部门执行政策规定标准不一,执法自由裁量权大”,也是众多民营企业经常遇到的典型问题,并严重制约民营企业的发展,甚至影响到民营企业的生存。国务院通过这次座谈,虽然不一定能一步到位地解决民营企业的一些“憋屈”,但至少能够较有针对性解决一些陈年积弊,并以此倒逼改革,促使政府职能部门朝服务型政府高效转变。

退休官员任独董 还是让人有点读不懂

龙继辉 时评人

自2013年中组部下发被称为18号文的《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后,掀起了上市公司官员独董的“离职潮”。截止到5月18日,人民网金融通过wind数据终端梳理,发现在市值排名前100名的上市公司中,目前只有22位政府退休(或离职)官员任独立董事。(5月20日人民网)

自古至今,升官发财是人们孜孜以求的“奋斗目标”。可是,面对公务员薪水不高的现实,你能升官发财吗?而且,随着八项规定的“横空出世”,灰色收入早已成为“尘封的往事”。升官想发财,除非贪污和受贿的“旁门左道”一条“捷径”可走。你想,科级领导干部一年4.5万的年收入,能发财吗?“要想发财,不要当官”已成为公务员自我“安慰”的“座右铭”。

有的领导干部为了远离经济“苦海”的“折磨”,毅然选择了辞职下海经商的“阳光大道”。在一些官员的眼中,公务员职业不过是一块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但是,公务员较为稳定的收入,还是让不少官员下不

了“撤退”的决心,好在退休官员正好可以“两不误”。于是,退休高官纷纷到企业里“大展宏图”,成就“淘宝梦”。

要说经营企业,退休高官并没有一技之长。但是,他们良好的社会关系和人际资源却是企业老板最为“看中”的“空中”优势。企业就想利用退休高官的这一“特长”为企业发展锦上添花,好让企业“赢在起跑线上”。然而,这样一来,却造成了市场经济主体的不公平竞争。所以,2013年中组部毅然举起了“杀威棒”。自中组部《意见》出台后,掀起了上市公司官员独董的“离职潮”。他们离职的原因,你懂的!

但是,还是有胆大的退休高官在独董“进行时”。截止到5月18日,人民网发现在市值排名前100名的上市公司中,目前还有22位政府退休(或离职)官员任独立董事。退休高官任独董,还是让人有点读不懂。

不可否认,22位政府退休(或离职)官员中,肯定有符合《公务员法》和中组部《意见》的。不过,可能还有一些不符合规定的。一类是现在仍然可能违反《公务员法》及中组部《意见》的。《公务员法》第一百零二条规定:“公务员辞去公职或者退休的,原系领导成员的

公务员在离职三年内,其他公务员在离职两年内,不得到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任职,不得从事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营利性活动”。61岁至63岁的有7个人,这些都可能是符合“原系领导成员的公务员在离职三年内”的规定。还有副部级高官退休的,因其是65岁退休,所以,68岁之前可能都还不符合《公务员法》及中组部《意见》的规定。二类是原到企业任独董时不符合《公务员法》及中组部《意见》规定,现在才符合的情况。

俗话说:“饿死胆小的,胀死胆大的”。既然还有退休高官违规任独董的情况。所以,为了给市场经济主体一个平等的发展竞争机会,还得对违规独董痛下杀手才对。原来组织部门已经挥泪斩马谡了,现在还必须来个“回马枪”以正视听。此外,县级以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也应该主动“出击”,依法没收违规退休高官从业期间的违法所得,责令接收单位将该人员予以清退,并根据情节轻重,对接收单位处以被处罚人员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只有双管齐下,退休高官任独董的“混乱”局面才不会“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晴川 机关职员

买包烟又贵了一元多,随着财政部要求提高香烟的消费税,香烟的零售价最近迎来了一波上涨。据统计,每年我国有100万人死于烟草,约占全球的1/4,并且如果不做改变,2020年这一数字将达到200万人。据测算,我国若每包卷烟增加从量税1元,也就说每支卷烟增加从量税0.05元,则政府财政收入将增加649亿元,同时,还将挽救340万人的生命。(5月18日《广州日报》)

抬高烟草税收,既符合国际惯例,客观上也的确可使烟民下降,但这部分人都是对价格敏感者,对“老烟枪”却很难形成制约力,想抽的照样会吞云吐雾。这显然是不够的。事实上,我国目前的控烟法规条例已经出台不少,但控烟效果却总是差强人意。要说原因,与我们总是习惯于管控烟草消费层,跳不出以“钱币”惩罚的执罚思维窠臼不无关系。

抬高烟草税收,出发点在民众健康。这点毋庸置疑。虽然烟民害人害己,但作为一种习惯,有着巨大的社会心理基础,不可能全面禁绝。而抽烟本质上也是个人权利,只要不违法,就应得到保护。烟草税虽具有补偿性和强制性特点,但从道理上讲,也是普通税收之一,因而应取之于烟民,用之于烟民。增收的巨额烟草税费,如何避免遭遇与社会抚养费一样的社会质疑,唯一的办法就

是收的清楚,花的透明。而如何花,则大有讲究。比如,可以设立专项基金,专款专用,以帮助瘾君子戒烟,帮助困烟患者治病。有罚有奖,赏罚分明,对戒烟尤其是“老烟枪”无疑会起到积极效果。涉及公众利益的行政决定,必须充分尊重民意、民智。如果随意挪作他用,则救人是假,敛财是真。

控烟是个系统而复杂的工程,自觉不够、管理不严、带头不足等都是病根,而管控源头则是关键。这个源头,不仅是消费群体,更有烟草企业。烟民抽烟成本提高了,对烟草供应环节,同样需要提高经济成本。惩罚用力不均,部门利益、集团利益长期固化,这不利于社会控烟。吸烟之害,需要反复强化,尤其要通过让黑肺图片印刻于香烟包装等方式外化,以弱化烟草文化,这应成为烟草企业的社会责任中应有之义。

一项政策能发挥多大效力,能走多远,要看消费者支持和配合的积极性;而要激发全社会控烟的热情,营造无烟的健康环境,也要调动全民监督的积极性。这亦需要通过适当奖励来刺激。而要形成全社会配合氛围,还要从娃娃抓起,从小培养禁烟意识,逐步养成不吸烟和尊重他人的良好习惯,树立起起码的社会公德。等等。管住吸烟者是社会期待,但控烟也绝非易事。这些具体问题不解决,抬高烟税就难逃敛财嫌疑。一项措施得不到社会认可和支持,于控烟,只能是空对空。

公益彩票何以沦为私人“老虎机”

邓海建 媒体人

国家审计署于2014年启动的针对18省市的彩票专项整治,对于尚未公布的审计结果,公开的表述为“部分省市工作中存在违规违纪、滥用资金、制度缺失、管理不严、监管不力等问题”,但细节可能触目惊心。记者了解到,隶属于中国福利彩票范畴的福彩即开型彩票——中福在线,成了私人牟利工具,其管理运营公司中彩在线名为国有控股,实为私人掌控。(5月21日《成都商报》)

彩票与博彩的区别,在于其资金用途的公益性。换句话说,如果彩票受益最终流入个人腰包,这就跟私人开设的“老虎机”没什么区别。近日,舆论曝出“中福在线为个人牟利超40亿元”。诸多权威媒体抽丝剥茧,还原出令人瞠目的真相。简言之,就是中彩在线总经理贺某,通过控制公司的第二和第三大股东,使得中彩在线名义上为国有控股,实际已被其个人曲线掌控。而遍地开花的“中福在线”,即是由中彩在线“独家运营”。

中彩在线公司或因审计署的“突击审计”而露出真面目。据称,按照股权比例计

算,过去12年,贺某通过中彩在线获得27亿元的收入,而代表国家的福彩中心仅获得18亿元。尽管当事方三缄其口,但审计署表述起码也坐实了一个共识:中国彩票业的公信危机,说到底,是制度危机、监管危机。

个人控制国企,一度“隐身”12年。这在公司治理与审计监管中,算不算一个天大的笑话?值得注意的是,早在2007年末,《南方周末》便以《中福在线:彩票时代的“老虎机”》为题报道,揭示出诸多关联性问题的,多个城市关停销售厅。检索新闻可知,“三部委联手整顿 中福在线彩票濒临关停”等历历在目。但蹊跷的是,后又悄然开张,且近年销售厅数量急速增长。这背后,经历了怎样的“波折”,没人能说清楚,也没人出来说清楚。

这还仅仅是一个“中福在线”踢爆的诡异情节。财政部数据显示,2014年,我国彩票销量3823亿元,同比增幅高达23%,照此增速,中国彩票将在2016年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按照发行费不高于15%的规定,过去一年中,彩票机构及代销企业、销售人员共分近500亿元。在“互联网+”的旗帜下,可以预期

的是,中国彩票行业迟早会迎来市场膨胀与扩张期。数量惊人的彩票,如何保证衍生利益的公开透明,遏制彩票行业的寻租腐败,这不仅是“拍蝇打虎”需要直面的课题。

这一次,审计署审计出的问题,尽管未知何故尚未公开,恐怕也只是将传闻与担心坐实为案例与数据。值得反思的是:一则,“中福在线”沦为私人控股,媒体言之凿凿,即便当事人沉默以对,主管部门何以不声不响?如此重大的信息披露,纪检监察如何“接盘”?二则,除了“中福在线”之外,资本大鳄以公谋私、化公为私的“彩票游戏”,究竟有无别家?庞大的彩票产业链上,又寄生了多少私人利益?

除了制度与监管的追问,我们当记得早在2012年,北师大“中国彩民行为网络调查”一石激起千层浪。调查结果显示,被时问题彩民就大概有700万,至少有43万人重度购彩成瘾。即便中国彩票业有朝一日河清海晏,恐怕也不该继续夸大一夜暴富的神话——没有亿万民众的血汗,巨奖如何兑现?眼下来说,至于公益彩票沦为私人“老虎机”的忧虑,亟待官方版的“下回分解”。

戏画闲言

漫游费:百亿收益零成本



吴之如 文并画

《经济参考报》报道,粗略统计,我国移动漫游费一年收取上百亿元。近年来,手机用户与通讯运营商频频因高额漫游费用发生纠纷。记者调查发现,从技术层面来说,已收取20余年的国内漫游费目前成本已“几乎为零”,运营商却仍在收取。

既然国内“漫游费”已经“零成本”,却为什么还要向消费者收取每年上百亿元的费用呢?说到底,无非是“三大运营商”貌似呈竞争之势,其实还是联手垄断的官办实体而已。这个项目不费分文成本,可还是要收你一大笔钱,不服吗?除非你不这一通信功能,要用就得向我立的规矩低头,因为事实上除了俺哥仁别无分店嘛!

某些国企央企的垄断地位,养成了其运营部门的十足官气、傲气和霸气。他们的决策层除了盘算自己能轻松地让亿万百姓兜中抠到多少真金白银之外,好像对于是否能为用户的切身利益考虑多少并无多大兴趣。拼命地从消费者身上榨取利益,几乎成了他们的唯一目标,“为人民服务”的口号对于他们而言未免太虚幻了。有道是:

百亿收益零成本,“漫游”利润狂升腾;天落馅饼吃不尽,错觉垄断是福根。或许,某些“官商”视消费者为“唐僧肉”,动辄猛咬一口大快朵颐以解其饕的任性脾气,正是多年的垄断宠出来的坏习性。到了各行各业深化改革的今天,这一状况也真该改一改了。譬如这通信信息企业,能否就从取消已经零成本的国内“漫游费”开始?

给“拼车软件”一个合法的身份

江德斌 时评人

最近,拼车APP突然大量涌现,诸如嘀嗒拼车、51用车、微微拼车等。北京市交通委在2013年底出台关于小客车合乘的指导意见,不少专车软件推出拥有“合法”头衔的拼车业务。尽管有政策作为支撑,但与此前“专车”模式遭遇相似的是,拼车业务仍难逃“非法运营”的嫌疑。专家认为,合乘需要符合顺路、提供者提供服务次数有限和合乘目的由提供者发布等多个特征,而部分拼车类软件并不符合特征,更像是私家车接入运输行业提供运营服务。(5月14日《北京青年报》)

拼车本身是市民自发行为,并非为了赚钱,乃是利用汽车闲置座位资源,与他人共同上下班或出行,合理分担相关费用,从而实现多赢局面。拼车不仅可让车主降低使用成本,为拼车者提供出行便利,亦可有效利用存量汽车资源,缓解城市交通拥堵压力,降低汽车尾气污染源。北京市交通委此前发

布政策鼓励市民拼车出行,就是看到这些优点,对治理城市拥堵、空气污染有帮助。

拼车软件顺应市场需求而生,利用软件平台打通拼车信息资源,使得车主与拼车者之间的沟通更加方便快捷,相关信息亦透明化,双方都有了更多选择机会。拼车软件所采取的客户评价模式,可以让拼车挑选最合适的车主,从而倒逼车主加强服务意识。而且,拼车软件乃是实名制注册,车主资料、拼车信息、拼车路线、时间等都一目了然,一旦发生事故,可以倒追溯源,从而解决拼车出行的人身安全保障,比“黑车”的信息黑洞要进步太多。

在打车软件介入出租车行业之后,犹如鲶鱼搅乱了池水,亦不断挑战行业“潜规则”,陆续推出的专车、拼车服务,可以看做是对打车软件业务的延伸拓展,乃是针对不同细分市场需求。显然,相比僵硬死板、弊病丛生的出租车行业,打车软件、专车软件、拼车软件的面世,以更为灵活方便、贴近市民、

服务优质、信息透明等优势,快速赢得公众的认可,并抢占下越来越多的市场份额。

出租车行业弊病太多,既得利益者不肯割舍,管理部门涉足利益太深,地方政府亦投鼠忌器,导致行业改革裹足不前,饱受民众的批责和不满。拼车软件乃是针对市民自发拼车行为,通过信息化手段加以整合优化,符合“互联网+”经济特征,实现多赢格局,但对传统出租车行业和监管部门则形成了挑战,并且触碰到部分人的利益,很难说会不会遭到类似打车软件、专车软件一样的打压。

至于拼车软件存在的一些问题,都可以在竞争中不断改进的,并不值得过分担忧,反而需要关注的,乃是监管部门的态度,是否会出手扼杀这一新生物。从社会发展趋势来看,拼车软件符合共享经济模式,又有那么多的益处,受到民众的广泛支持,显然不应以“黑车”来对待,倒不如顺应时代潮流,给其一个合法的身份。